

生活史的又一高峰期

酒宴

衣食住行的「二十四朝之皇帝」

座次、分餐与合餐

等级制前提下的地域性

传食律

传承性基础上的变革

城邑布局

种类与样式

皇清

皇服

豪门大宅

软侯服饰

二十一

史服

室内用具

秦汉衣食住行

(插图珍藏本) 刘德增著



秦汉衣食住行

(插图珍藏本)

刘德增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汉衣食住行(插图珍藏本)/刘德增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5.3

ISBN 978 - 7 - 101 - 10672 - 5

I. 秦… II. 刘… III. 社会生活 - 历史 - 中国 - 秦汉时代
IV. 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0318 号

书 名 秦汉衣食住行(插图珍藏本)
著 者 刘德增
责任编辑 陈 虎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精彩雅恒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20×980 毫米 1/16
印张 20 1/2 字数 150 千字
印 数 1 - 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10672 - 5
定 价 59.00 元

目录

绪言……1

一 生活史的又一高峰期……1

二 衣食住行的「二十四朝之皇帝」……1

三 等级制前提下的地域性……5

四 传承性基础上的变革……12

衣……17

一 种类与样式……19

二 皇服……28

三 软侯服饰……49

四 吏服……59

五 军服……75

食 ······ 109

- 六 民服 ······ 81
七 囚徒服装 ······ 99
八 「左衽」新解 ······ 101

- 一 一日两餐 ······ 111
二 从曲突徙薪说起 ······ 140
三 一日四餐的皇帝 ······ 148
四 贵族菜谱 ······ 152
五 酒宴 ······ 153
六 座次、分餐与合餐 ······ 172
七 传食律：公务接待规定 ······ 186

住

189

一 城邑布局

191

二 皇宫

198

三 豪门大宅

219

四 二字二内

229

五 室内用具

238

行

259

一 道路修治

261

二 卮簿

269

三 辕车及其他

279

四 乘马

289

五 舟船……

296

六 邮、置与亭……

302

七 邸、逆旅与客舍……

306

八 传、符与节……

308

参考文献……

315

绪言

一 生活史的又一高峰期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京城长安（今属陕西西安）。

“盐铁会议”隆重举行。

会议的主题，是检讨汉武帝一朝政策之得失。丞相田千秋主持会议，御史大夫桑弘羊以及丞相府、御史大夫寺的官员与会。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民间的代表“贤良文学”六十多名，他们在一次发言中，盛赞古人生活之纯朴，贬斥时人衣食住行之奢侈。桓宽将他们的发言记录在《盐铁论》之《散不足》一篇中。从贤良文学是古非今的长谈



► 漆案与杯盘（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方形漆案上，摆放着五个漆盘、一个漆耳杯、两个漆卮杯，还有竹箸、竹串，个别盘内残存食物。

阔论中，可以窥见衣食住行的长足发展。以饮食为例，贤良文学说，古人吃的是黍稷野菜，来了客人，手抓猪肉就是最好的招待了；及至汉代，已是“殽旅重叠，燔炙满案”，他们随口罗列了一大批美味佳肴，诸如“杨豚韭卵”、“狗臚马臚”、“煎鱼切肝”、“羊淹鸡寒”、“蹇捕胃脯”、“脯羔豆赐”、“鷄臚雁羹”、“臭鲍甘瓠”、“热粱和炙”等等^①。

贤良文学们的发言不虚。

越此上溯一百多年，长沙国（都治临湘，今属湖南长沙）丞相、轪侯利苍一家的饮食生活，远比贤良文学们描绘的奢华。1972年，利苍及其夫人辛追、儿子利豨的墓葬在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东屯渡乡（今马王堆街道办事处）一个叫“马王堆”的地方被发现，墓中出土《遣策》记载的菜谱，令今人叹为观止。

饮食如此，衣、住、行的发展同样达到了新的高峰。

当然，能够享受华衣美食、豪宅安车者，只是那些王公贵族、富商地主，一般百姓生活的改善远不及此。如吴县（今属江苏苏州）有个名朱买臣的，年龄略小于利豨。朱买臣的少年与青年时代，正当社会趋于稳定、经济日渐繁荣的“文景之治”。但是，朱家却一贫如洗。到了四十多岁，朱买臣也未能解决温饱，

^① 杨，当作“煢”。杨豚：烤小猪。韭卵：韭菜炒鸡蛋。臚：当作“牒”。狗牒：把狗肉切成薄片。臚：当作“臚”。马臚：马肉汤。淹：同“腌”。羊淹：腌羊肉。彭卫先生认为汉代没有腌肉，“羊淹”当即“羊腊”（彭卫：《汉代饮食杂考》，《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鸡寒：当为风干鸡之类。蹇捕：兔脯。胃脯：胃干。脯羔：煮烂的羔肉。豆赐：豆饴。鷄臚：用幼雏做的肉羹。雁羹：用雁肉做的羹。热粱和炙：温度恰到好处的米饭和烤肉。

夫妇两人靠砍柴割草卖几个钱度日。朱买臣好读书，一边挑着柴草走路，一边诵读《春秋》、《楚辞》。妻子负薪相随，薪重如山，步履艰难。看到朱买臣边走边读，心中烦躁，叫他不要再读了。朱买臣不听，妻子制止他一次，他的声音就提高一个分贝。妻子愤懑不已，要求离婚。

朱买臣说：我年五十岁当富贵，如今已经四十多岁了，你跟着我受苦多年，等我富贵了报答你。

妻子骂道：像你这种人，终将饿死荒野，哪里会有什么富贵可言？

朱买臣无奈，只好听任妻子离他而去。

一天，前妻与她的后夫上坟，碰见朱买臣在坟地割草，前妻看他面如菜色、衣衫褴褛，心中酸楚，就把他叫到跟前，拿出一些祭祀用后的食物，让他吃了个饱。

像朱买臣这样生活水平之人，当时应不在少数。

二 衣食住行的“二十四朝之皇帝”

1902年，三十八岁的杭州人夏曾佑母丧丁忧，撰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于1904年初版，这是第一部新体中国史。1933年，商务印书馆将此书列入大学丛书，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夏曾佑认为，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两个皇帝是秦始皇、汉武帝：

有为汉一朝之皇帝者，刘邦是也。有为中国二十四朝之



◀ 天子车图（陕西靖边杨桥畔出土汉墓壁画）

此车样式如同轺车，朱右轓，驾一匹枣红色马，黑蹄黑鬃，奋蹄昂首嘶鸣。御者端坐，戴进贤冠，穿黑袍，双手持缰。车盖上方有隶书题榜“天子车”。根据《汉书·景帝纪》，二千石官员之车朱两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朱右轓之车不见文献记载。此盖为民众心目中的“天子车”。

皇帝者，秦皇、汉武是也。^①

秦始皇凭借商鞅变法以来奠定的强大国力，吞并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的国家。他厘定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勾勒出此后中国二千年封建统治方式的蓝图。汉武帝则进一步巩固了统一，完善了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正如夏曾佑所说，秦皇、汉武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厘定的一系列制度，影响所及，自秦汉以降，至于明清。

秦皇、汉武也是衣食住行的“二十四朝之皇帝”。

秦始皇用制度规定了全国臣民的衣食住行，虽然传世文献不见这方面的记载，但湖北云梦、湖南里耶、甘肃天水等地出土的秦简透露了这一信息。如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一座秦墓，墓主人名“喜”，在安陆县（今属湖北云梦、安陆一带）、鄖县（今属湖北宜城）做过县吏。该墓出土了一千一百五十五枚竹

^①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55页。

简（另有残片八十片），其中有关于公务接待标准的专门法律《传食律》，还有很多关于衣食住行的规定散见于其他律令之中。如居住在乡村的百姓不准卖酒；二月至七月，不准猎食幼兽、雏鸟、鱼、鳖；粟按加工粗细程度，分为粝米、糁米、縠米三种；不准穿用丝编织的有花纹的锦履，等等。上述规定见于《田律》、《仓律》、《金布律》等，规定具体、细致、明确。

秦亡汉兴，刘邦及吕雉太后当政时，在衣食住行方面也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及至汉武帝，除颁行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极大的盐、酒官营制度外，更重要的是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西域的胡床，特别是一大批水果、蔬菜陆续传入中国内地；中国内地精美的丝织品，也传入西域以及更远的西方。“丝绸之路”的开辟，在中外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经秦、西汉、新莽、东汉四个王朝，统称为“秦汉”的四百四十一年历史，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这一时段，是最为重要的发展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时期。此时段推出的衣食住行制度，对后世的影响极大。

三 等级制前提下的地域性

衣食住行，是民俗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定义“民俗”云：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

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①

关于这种民间文化事项，中国历史文献中也称之为“风俗”、“习俗”、“谣俗”等，其中犹以“风俗”一词最为流行。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中定义“风俗”曰：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班固的定义，揭示了风俗的两个成因：第一，自然环境的影响——“系水土之风气”；第二，社会因素的影响——“随君上之情欲”。具体的民俗事项，有不同的成因，但从宏观考察，班固的观点是正确的。

影响衣食住行的因素，也主要是社会因素与自然环境。

中国社会发展到秦汉时期，进入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时代，这种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是等级制，该制度以皇帝为至尊至上，其下有两种分级方式：一是以官秩高低区分公卿百官，以有无官秩划分吏民；二是以爵分等，诸侯王之下，再分二十等，有些百姓也有爵位。

衣食住行作为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可以最常态、最直观地反映等级制，故成为标识、体现等级制的核心领域。在衣食住行的

^①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 《汉殿论功图》(明刘俊绘)

各个方面，皆有等级制的烙印。这些等级之别，大都以法律条文加以明确、巩固。以住宅为例，1983年在湖北江陵（今属荆州）发现一座土坑木椁汉墓，墓主生前是一位低级官吏。墓中出土了一千二百三十六枚竹简，分为八种^①，其中之一是《二年律令》。《二年律令》写于第一枚简的背面，是二十七种律和一种令的总称。据竹简整理小组考证，这是吕雉二年（前186）颁布的法令。

其中的《户律》，对从位极人臣的彻侯到沦为阶下囚的罪犯住宅之大小，作了明文规定，以一宅三十步为标准计量单位，将他们划分为二十二个等级，最高等级的彻侯一百零五宅，最低等级的罪犯半宅。一步六尺，一汉尺约等于零点二三米，一宅为四十一点四平方米。第一等级四千三百四十七平方米，第二十二等级二十点七平方米。

但是，在时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往往想方设法突破等级制的



^①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限制，追求更高档次的衣食住行。受等级制框限最强而又最富有的商贾是急先锋，诸如商人不得衣丝乘车等规定，最终被他们突破，形同虚文。

民俗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地域性。对此，汉时人就有深刻的感受，“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是那时的一句口头禅^①。这种地域性，就是今人常说的“民俗区”或“民俗圈”，汉时的名称叫“地分”^②。

西汉人经常提到的区域概念，是“山东”与“山西”。这里的“山东”、“山西”指崤山之东、西。崤山上有座沟通东西的关隘，曰函谷关，故“山东”、“山西”也谓之“关东”、“关西”。东、西之分，始于“山东”六国与秦的对抗。劳榦先生说：“战国秦汉时代所谓‘关东’和‘关西’，在政治方面的意义，实在超过了文化上的意义及民族上的意义。”^③入汉以后，随着山东六国遗民对故秦敌意的逐渐消除，“山东”与“山西”或“关东”与“关西”，只是自然或文化的划分。时人提到的另一个地域分野，是南北的差异，他们笼统地以江淮划分南北，但在他们心目中，南北之分远不及东西之别重要。

这种东西、南北划分过于宽泛，西汉人曾对民俗区做过更为

① 《汉书·王吉传》。

② 北宋景祐本、清乾隆武英殿本《汉书·地理志》都作“地分”，王先谦《汉书补注》本则作“域分”，中华书局校勘本以为“地分”是，姑且从之。

③ 劳榦：《关于“关东”及“关西”的讨论》，载劳榦：《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上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1—133页。



▲ 出行图（内蒙古鄂托克旗凤凰山一号汉墓出土壁画）

具体的划分。先行者是司马迁，他把全国划分为九个民俗区。继司马迁之后，汉成帝君临天下时，又作了一次划分。这是一次有组织、有分工的民俗研究活动：时为谏议大夫的刘向划定“地分”，朱赣逐条陈各地民俗。朱赣是颖川（今属河南）人，当时在丞相张禹手下做僚属。班固著《汉书·地理志》，把刘向、朱赣的研究成果收入篇末。《汉书·地理志》把全国划为秦、魏、周、韩、赵、燕、齐、鲁、宋、卫、楚、吴、越十三个民俗区。司马迁特别是《汉书·地理志》划分的十三个民俗区，缺憾不少，遭到后人批评。有鉴于此，今日学界补苴罅漏、匡失救弊者不乏其人，最具代表性的当推周振鹤先生。他严厉地批评了刘向的“地分”，然后把《汉书·地理志》篇末的民俗资料加以“重新组合”，把两汉民俗分为“塞上塞外民俗区域”、“黄河下游民俗区域”、“淮汉以南民俗区域”，其下又划分为十六个民俗区、十五个民俗亚区^①。

到汉武帝君临天下，黄老无为的历史使命结束，儒家思想登上“独尊”地位。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整齐民俗的一把利刃。不过武帝忙于南征北伐，无暇顾及移风易俗之事。此事到他的曾

^① 周振鹤：《秦汉风俗地理区划》，载周振鹤主编：《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7—128 页。



◀ 侍奉人物图（内蒙古鄂托克旗凤凰山一号汉墓出土壁画）

两位侍者侧身站在屋门左边。屋门框用黑线勾框，内有赭色木纹。上方有红色半月形垂帐。前面一人身着黑色右衽长袍，内穿红色中衣，双手合于胸前，左臂上搭一绿色长袍；后面一人身穿浅黄色右衽长袍，内穿白色中衣，双手合于胸前，怀抱红带囊物。两人皆戴宽沿黑帽，帽侧插翎。这种帽饰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孙宣帝刘询君临天下时，才由那些“循吏”在一些郡国付诸实施。自此以降，移风易俗成为郡国守相的一项重要职责。各位郡国守相的移风易俗，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自宣帝、特别是入东汉以后，民俗的特征起了一些变化。宣统三年（1911），张亮采完成《中国风俗史》一书，他认为两汉民俗的变化是：“西汉重势利，东汉多气节。”^①如是说有点过于简单化。周振鹤先生云：

经过两百年的移风易俗的过程，使西汉后期原有的八方殊俗异彩纷呈的风俗渐渐地趋于六合同风的单一化形态，因此密集的多元的风俗文化区已经消失，尤其中原地区的那种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面貌已不再现。在东汉后期，我们已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划分新的风俗区。^②

^① 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② 周振鹤：《从“九州异俗”至“六合同风”》，《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4期。